

# 「萬物生長靠太陽」與原始崇拜

• 王 毅

「萬物生長靠太陽」，是「文革」中億萬崇拜者對毛澤東無比崇高地位和無限廣大威靈的一句典型的頌辭，類似的頌辭多得不計其數。眾所周知，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僅在「文革」時發展到極為狂熱的程度，而且這種狂熱崇拜本身就是「文革」的基本內容之一。它不僅與發動「文革」，以及一切政治力量的生死存亡有着最直接的關係，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億萬中國人生存的基本方式和終極目的。那麼，民眾對「大救星」的普遍信仰意識從何而來？它又是怎樣參與着「文革」的發動與運行呢？

本文僅從宗教人類學的視角試圖指出：「文革」期間民眾對毛澤東的無限尊崇及由此伴生的種種舉措，實與原始文化的圖騰崇拜有着驚人的類同；並由此進一步揭示這種狂熱崇拜所隱含的文化功能。

## 一 圖騰和「大救星」

作為曾經長期、廣泛地支配整個世界的一種文化體系，圖騰制度的功

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也是與「文革」關係最為密切的，則有三個方面：(1) 對內凝聚、統一本氏族成員間的情感和建構血親組織，對外抗禦異族文化、並與其社會組織嚴格區別；這實際上就是建立圖騰文化的活載體和社會組織的形態；(2) 通過對圖騰和「大救星」的信仰，使處於貧弱危難中的氏族先民維持其生存延續的基本推動力，並且有能力從這低狹悲苦的物質生活水準中昇華出相對輝煌的文化制度和文化象徵；(3) 憑藉對圖騰和神物的信仰感知周圍的一切，從而建立起對宇宙的完整認識，並在紛繁的世界中確立每個人的位置。

原始先民生活在無窮無盡的危險和災難之中，因而對苦難的恐懼便成了他們的思維基礎。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特別強調這種由畏怖產生的對神的依賴感在宗教中的意義。反過來說，就是除了神以外的一切人都處於卑微無助的境地，而神君聖王臨世的目的就是救民於水火。這種原始宗教的餘緒一直延續到「文革」，例如①：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僅在「文革」時發展到極為狂熱的程度，而且這種狂熱崇拜本身就是「文革」的基本內容之一。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億萬中國人生存的基本方式和終極目的。

在大寨，……有人甚至斷言：「毛澤東思想是靈藥，誰吃誰見效。」大寨有位社員患了疾病，他靠背誦「老三篇」，終於戰勝了病魔，事後有人請他談體會，他說：我這個人沒文化，就能說兩句話：「千服藥萬服藥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寶書治好了我的病。」

又如一首當時流行的歌曲中所唱②：

啊！千年的鐵樹開了花開了花，萬年的枯藤發了芽發了芽。如今咱聾啞人說呀說了話，感謝毛主席恩情大恩情大。

上述兩例十分典型地反映出，「文革」中對「紅太陽」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與解救個人病痛苦難相聯繫的。「大救星」更偉大的意義在於：他是唯一能夠在整體上拯救人類的力量。所以當時的人恰恰是把這種崇拜視為指引自己擺脫蒙昧苦難的「紅太陽」。

「把自己掏空」是原始崇拜的基本方法，那麼使「紅太陽」、「大救星」神光日照的造神過程，當然也就是崇拜者日益萎縮的退化過程。文學理論家劉再復先生曾生動記述這種全民族的蛻變③：

當時紅衛兵小將們稱毛澤東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因為年青，這種說法尚有尊老的天真味。而七、八十歲的老同志老先生說話，也口口聲聲稱「毛主席他老人家」，其味道就不相同。後來，又聽到小將們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也還動聽，有些甜味，而聽到七、八十歲的老同志老先生唱，就覺得彆扭，……本世紀下半世紀（中國）大陸這種故作小兒態的撒嬌性的詩文實在太多，……好些

老詩人老作家好像是「長不大的小老頭」。

其實，在圖騰和祖先神以及代表神意的祭司、酋長面前，子民們必須永遠處於無知無識的幼弱狀態，這本是上古原始崇拜的基本準則。因此，一直到周代，人們在稟承神意時仍然循此傳統而誠惶誠恐地說：「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嗚呼，天明畏。」④這裏「小子」並不是專指青少年，而是所有崇拜者在神明面前的自稱⑤。周公在其晚年向祖先神祈禱時，仍自稱「予小子」⑥；而周恩來總理在「文革」中反覆重申：「我們有錯誤就改，跟緊毛主席，跟的不緊，再犯錯誤，再改，再緊跟，就這樣，……要做毛主席的好戰友、好學生」⑦；「……學到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我是一個老黨員，時時刻刻跟着主席也有時跟不上」⑧。

原始文化認為宇宙間的萬靈萬物都是由圖騰和祖先神賜生的，所以它總是會自覺不自覺地以養育萬靈的母親為其或隱或顯的象徵。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革」的造神，是嚴格地恪守着原始崇拜基本準則和內在邏輯的。

這種祈母式的宗教情結在「紅太陽」崇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當時人人必須每天多次唱頌「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在紅衛兵創作的《紅太陽頌》中，作者署名為「北京向日葵」，並寫道：「我手撫天安門紅牆，像孩子呀依偎着親娘。」⑨又如歌曲中記述紅衛兵受到毛澤東接見之後的感受⑩：

紅彤彤的太陽從東方升起，金色的陽光普照大地。為甚麼太陽這樣暖，為

祈母式的宗教情結在「紅太陽」崇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當時人人每天唱頌「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紅衛兵寫道：「我手撫天安門紅牆，像孩子呀依偎着親娘。」

甚麼幸福熱淚流不息。因為我們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

原始崇拜的另一重要功能，即圖騰和神物崇拜曾是人們感知大千世界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渠道，憑藉這種崇拜，原始時代的人們才能建立對宇宙的完整認識，並建立起完整的社會組織。

在「文革」中，一方面要破壞一切現有的社會組織和規範（如「破四舊」），另一方面要以「紅太陽」為核心而建立完整的新文化體系、文化制度和神話般的世界理想。這種新秩序超出了中國範圍，受到世界人民的熱烈歡迎。有作者回憶道①：

文革時的報紙上常出現整版的「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或「世界人民支持文化大革命」，圖文並茂，具體生動，無數感人的例子曾經使人熱血沸騰。如某國勞動人民如何冒着生命危險珍藏着寶像寶書，堅持早請示和天天讀；蘇聯的老工人、老黨員如何努力學習毛選，怒斥蘇修叛徒集團的罪行。我記得還報導這樣一件事：在非洲某海港，一位黑人碼頭工人向我們的海員要毛主席像章。海員見他光着上身，不無猶豫，不知他將如何佩戴寶像。但這位工人獲得像章後，毫不猶豫地將它別在胸前的肌肉上，並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

與描寫圍繞日月山、天樞「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的原始神話一樣，諸如此類不計其數的「文革神話」也具有非常具體、現實的文化功能：既然「紅太陽崇拜」是唯一具有終極價值的世界組織形態，那麼這種形態的核心和發源地（「文革」時流行的說法是「世界

革命的中心」、「紅太陽升起的地方」）、以及諸如「文革」等維繫和弘揚這一核心的文化制度，也就具有了無比神聖的地位，並理所當然地成為「倍受鼓舞」的六億人民唯一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正如英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揭示的那樣②：

神話有建立習俗，控制行為準則，與賦予一種制度以尊嚴及重要性的規範力量。

神話在原始社會中施行一種不可或缺的作用：神話表現信仰、加強信仰，並使信仰成為章典；……它保證儀式的效用並包含指導人類的實際規則。

「文革」中的毛崇拜正是依靠「萬物生長靠太陽」的神話和信仰才能實現的。

## 二 「早請示、晚匯報」與禮神儀式

在原始文化時代，人們需要通過具體儀式來表現他們對圖騰和「大救星」無限的崇拜，而崇拜儀式至少要有兩方面的社會功能：(1) 必須使崇拜者能夠最大限度地向神明奉上自己的「無限崇拜、無限信仰」，同時又能使他們最大限度地感受到神明的崇高和無所不在；(2) 必須最大限度地防止和懲罰任何對神明的損害。這也就相應地形成了原始文化中兩項最具根本性和普遍性的文化制度：一是獻祭、祈禱等降神、禮神儀式，二是禁忌制度。在「文革」期間，我們也可以找到對應這兩種原始文化制度的現代形式，亦即：「早請示、晚匯報」與「上綱上線」。前者充當了降神、禮神

文革一方面要破壞一切現有的社會組織和規範，另一方面要以「紅太陽」為核心建立新文化體系和世界理想。文革時流行的說法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紅太陽升起的地方」。



儀式，後者則體現了圖騰的禁忌制度。

「早請示、晚匯報」是從「文革」初期開始，一直持續到1971年林彪死亡的「9·13」事件。這期間，幾乎全中國的成年人和青少年每天必要集體參加或獨自實行這種禮儀。「早請示」的方式是：每天早晨所有人在毛澤東畫像前列隊肅立，再大聲念誦：

敬祝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的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同時人手一冊的《毛主席語錄》舉過頭頂，隨着「萬壽無疆」和「永遠健康」的頌祝聲有節奏地揮動。然後高唱《東方紅》，念頌毛澤東的某些語錄。「晚匯報」的方式與「早請示」大致相同，只是將唱《東方紅》改為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那些年間流行的類似儀式還有「天天讀」（即每天恭誦毛澤

東的語錄或文章）、「語錄操」、「忠字舞」等等。總之，包括崇拜者敬慎的態度、虔誠的祝頌、起輔助作用的樂舞等宗教禮神儀式的基本內容。

自古以來，祈禱、獻祭等禮神儀式就是喚起人們宗教熱情的最直接方式。所以在崇拜儀式中，「思維不僅想像客體，而且還體驗着它。儀式和典禮在極多的場合中具有這樣一種後果：它們給予比如圖騰集團與其圖騰之間的真正的共生以實在性」<sup>⑬</sup>。可見，禮神儀式並不僅僅是宗教情感和信仰的付出方式，而且更是這種情感和信仰的獲得和強化方式，特別是由眾多信仰者的共同參與而更為強烈。典型的例子當然是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一位紅衛兵詳細描寫當時的場面和感受<sup>⑭</sup>：

……天安門前擁擠着成千上萬的紅衛兵！真是成千上萬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喊啊，叫啊，哭啊。那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狂熱場面！成千上萬紅衛兵匯成的人海，在天安門廣場

「早請示、晚匯報」是「文革」期間，中國的成年人和青少年每天必要集體參加或獨自實行的一種禮儀，類似儀式還有「天天讀」、「語錄操」、「忠字舞」等等。這些禮神儀式是喚起人們宗教熱情的最直接方式，亦賦予圖騰真正的實在性。

擰出海底谷裂般的漩渦！萬語千言變成一句話，有拍節地喊叫：「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當人們置身於集體膜拜的海洋中的時候，就只能用「萬歲」、「萬壽無疆」、「永遠健康」這類巫覡語言來表達狂熱的崇拜，並從周圍的狂潮中獲得最強烈的宗教體驗。

在「文革」中，與「早請示」等「紅太陽」崇拜儀式相伴生的，還有動員全社會的人力物力印製毛澤東的畫像、著作、製造各種材質的毛澤東像章、繡像之類狂潮。據一位「文革」文物收集專家的研究<sup>⑤</sup>：

大規模製造像章的歷史自1966年開始，至1971年夏結束，五年時光，據說造出了超過一萬種，至少二十億枚。……單是外型，就有圓的、方的、橢圓的、長方的、五角的、六角的、七八九十角的，和說不上算甚麼形狀的。而形象更五花八門，頭像、半身像、全身像、側面、半側面、正面、青年、中年、老年、講話、讀書、閱兵……再配上松、竹、梅、日、月、星、紅旗、天安門、延安城……還搭上少至二字、多至上百字的政治口號和語錄，真是變幻無窮。……據統計，在毛澤東著作被視同「革命者的聖經」時，共有五十餘種文字，五百餘種版本，總印數約五十餘億冊。如果把各派紅衛兵組織和「革命委員會」出版的算上，恐怕要有上百億冊。……其中最小的開本是五百一十二開，和火柴盒一樣大；最大的四開，和報紙一樣大。這些內容一律，開本和封面花樣無窮的書，比《聖經》的中文版本要多得多。……聽到「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錄製的唱片，

你只得佩服1967年的中國人會在一首歌裏唱一百三十多次「萬歲」。

「文革」中全社會裏任何行為或話語如果不能匯入「紅太陽」崇拜，那麼它們就不僅立即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亦同時被視為全民公敵而遭徹底鏟除。諸如「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從毛主席，一切緊跟毛主席，一切為着毛主席」等等誓言，成為當時億萬人的口頭禪。

### 三 文革中的禁忌與「觸染」

在原始文化中，對圖騰的無限崇拜與對圖騰極為嚴格的禁忌，是兩項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根本制度。與原始文化的情況完全一樣，「文革」中的一切神聖物、神聖觀念，依然與其禁忌性「在根源上是相同的」。

我們仍然可以從人盡皆知的「文革」例子入手：

毛主席啊，……我們對您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崇拜。最偉大的毛主席啊，億萬雙眼睛望着您，億萬顆紅心獻給您。……誰反對您，就是挖我們的心，要我們的命。為了捍衛您，上刀山，下火海，拋頭顱，灑熱血，我們心甘情願。

又如姚文元在批判陶鑄的著名檄文中如下邏輯<sup>⑥</sup>：

（陶鑄）一面說，人們以「東方紅，太陽升」來形容我們偉大事業的朝氣勃勃，「以太陽來歌頌我們的黨和領

在毛澤東著作被視同「革命者的聖經」時，共有五十餘種文字，五百餘種版本，總印數約五十餘億冊。其中最小的開本是五百一十二開，和火柴盒一樣大；最大的四開，和報紙一樣大。這些內容一律，開本和封面花樣無窮的書，比《聖經》的中文版本要多得多。

袖」；一面公然藉攻擊「太陽」的「過失」，指桑罵槐地說：「當大暑天驕陽似火，曬得人們流汗的時候，人們就會埋怨，說太陽的光和熱發射得過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並且也都指出過，太陽本身上還有黑點。」「太陽本身上還有黑點」。這不是赤裸裸地咒罵我們的黨和偉大的領袖嗎？……這是十足的資產階級的黑話，正好暴露自己是見不得陽光的鬼物。

在「文革」中，「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份子」幾乎即是「牛鬼蛇神」的同義詞，這也是因為按照圖騰制度的原則，觸犯聖物禁忌者即被視為敵族鬼靈的同類。

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對圖騰制度中神明所具有的「觸染」力量，作了如下的分析<sup>①</sup>：

神聖肌體如此纖巧，稍一觸及，便至混亂，好像充電似地具有強大的巫術的或神性的力量，凡與之接觸，便會放射出來，造成嚴重後果。……他的巫術性的特質，就極嚴格的意義說來，是觸染。

這在「文革」中的「紅太陽」崇拜中亦有非常典型的表現，例如<sup>②</sup>：

一些跟毛(澤東)握手的人，好幾個禮拜不洗手，親友攜老扶幼地趕來和他握手，彷彿這樣他們也沾到了一些「神明」的光采(彩)。……工人們將毛送的芒果供奉起來，用一小塊芒果煎成一大鍋水，大家喝一口，共享領袖的關懷。

同理，「文革」的禁忌制度也必然是充滿「觸染」性、恐怖性和極端神經

質的，所以它對任何哪怕是極偶然觸犯「紅太陽」之神聖性者，亦統統給予毀滅性的打擊而決沒有寬赦的可能<sup>③</sup>：

那陣子為一句話坐大牢的人多了去了，光我們那兒就大部分的現行反革命罪。我們屋裏有個犯人，以前是農協會主席，罪名就因為下山到集子上買毛主席石膏像，那會兒不叫買，叫「請寶像」，不是他這樣出身好的還沒有資格「請」。那玩藝兒挺沉，山道又不好走，他就用麻繩拴在石膏像的脖子上，前邊兒倆，後邊倆，就這麼背着趕路。沒想到還沒出集子就讓人給抓住了，好嘛，「現行反革命」，立時就抓起來，家也沒讓回，進大牢了，五年，您說冤不冤？

如果說諸如此類對「紅太陽」禁忌的觸犯還有一鱗半爪的實迹，那麼同樣眾多的慘禍則是因為種種匪夷所思、毫無蹤影的「觸犯」而降臨的，例如下面的事例<sup>④</sup>：

(1966年6月)一天，我們讀到一則《人民日報》報導，說有位農民在他家臥室牆上貼了三十二張毛主席像，原因是只要一睜眼，不論朝哪個方向，他都能看見毛主席的光輝形象。馬上，我們也在教室的牆上貼滿毛澤東的像——這樣我們也可以到處看見他的慈眉善目了。但是我們馬上又得揭下來了，因為有消息說，老農民其實是用毛主席像作貼牆紙，……消息還說已查出寫此則報導的記者是「暗藏的階級敵人」，想鼓勵大家「污辱毛主席」。第一次我下意識地感覺到毛主席的可怕。

一些跟毛握手的人，好幾個禮拜不洗手，親友攜老扶幼地趕來和他握手，彷彿這樣他們也沾到了一些「神明」的光采。……工人們將毛送的芒果供奉起來，用一小塊芒果煎成一大鍋水，大家喝一口，共享領袖的關懷。



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官方政策一直是反宗教的，但悖謬的是，毛在文革卻被樹為偶像，崇拜毛澤東變成唯一的宗教形式。

幾乎任何一個現在35歲以上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都必定曾經親手實施、親身遭受或親自耳聞目睹過千百件這一禁忌的實例。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禁忌在「文革」中具有普遍意義決不局限在「誓死捍衛紅太陽」本身，相反，按照禁忌的「觸染」原理和原始思維神秘的「互滲」原理，凡是附屬於「紅太陽」的一切事物（如神聖的組織、社會形態、片言隻語、「親密戰友」、名謂形象、居所用具，一直到「紅太陽」頒賜的芒果等細屑之物），一律毫無例外地「好像充電似地具有強大的巫術或神性的力量」，一律可以通過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觸染」使人在不知所措中觸犯其神聖的禁忌力，並使觸犯者遭到滅頂之災。任何對這一切最微不足道或風馬牛不相及的觸犯，也就必然成了危及整個社會乃至宇宙的滔天大罪。這種罪行追究法在「文革」（以及「反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文革」的預演）中極為流

行，甚至成為不成文法規定的通行鬥爭方式，其名曰「上綱上線」。同原始的圖騰禁忌一樣，「上綱上線」亦是為了防止神人、聖物受到任何可能的損害，所以它也是一種具有驚人「觸染」性和極端神經質的禁忌形式，例如②：

(19)60年，潔若聽說我在下邊（筆者註：指作者被定為「右派」後「下放勞改」）常吃生冷，怕我得鈎蟲病，在信裏給我夾了一小包值不上五分錢的灰錳氧。有人就立刻報告了大老粗隊長，說我從北京收到了高級藥品。這當然是頑固地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的表現。1959年冬天，第一次在農場做鑒定，由一位一道在改造的高中女青年來掌握。她可比刀筆吏本事大多了，能在我當時穿的一條褲子上，做出「仇恨社會主義」的大文章。

這種例子在「文革」時比比皆是。例如在成都，一位標語書寫者把「衷心熱

在成都，一位標語書寫者把「衷心熱愛毛主席」的「衷」字寫得有些像「哀」字，即受到殘酷折磨並被迫自殺。當時就有受害者總結這無所不在的禁忌是：「年查歲審都成罪，戲語閒談盡上綱。」

愛毛主席」的「衷」字寫得有些像「哀」字，即受到殘酷折磨並被迫自殺。在大寨，打撲克、戴手錶、穿衣服、說笑話等一切行為都可能觸犯「階級鬥爭」，等等。諸如此類的禁忌在理性思維看來幾乎是不可理解和極為怪誕的，但在原始思維和「文革思維」看來，卻不僅是最為理所當然的，而且尤其要像「萬物生長靠太陽」一樣，充塞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所以當時就有受害者總結這無所不在的禁忌是：「年查歲審都成罪，戲語閒談盡上綱。」

### 註釋

- ① 孫啟泰、熊志勇著：《大寨紅旗的升起墮落》（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109。
- ② 王倬詞、尚德義曲：〈千年的鐵樹開了花〉，《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不落的紅太陽歌曲集》（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77），頁214-15。
- ③ 劉再復：〈酸人論〉，載《人論二十五種》（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頁71。
- ④ 《尚書·大誥》，十三經注疏本，頁199。
- ⑤ 詳見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42-43。
- ⑥ 《尚書·金縢》，十三經注疏本，頁196。
- ⑦ 周恩來：〈在清華大學的講話〉（1966年8月4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第一集（書中未註明出版者和出版地，1966年12月），頁44。
- ⑧ 周恩來：〈在科學院辯論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4日），見上書，頁95。
- ⑨ 原載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大會《紅衛兵文藝》編輯部編：《寫在火紅的戰旗上——紅衛兵詩選》，1968年版，轉引自楊健著：《文化大革命中

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頁24。

- ⑩ 李德全詞、高士衡曲：〈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不落的紅太陽歌曲集》（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77），頁256-57。
- ⑪ 葛劍雄：〈世界上不止有中文〉，《讀書》，第11期（北京：三聯書店，1994），頁106。
- ⑫ 轉引自張光直：〈中國創世神話之分析與古史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8、65。
- ⑬ [法]列維·布留爾著、丁由譯：《原始思維》（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頁429。
- ⑭ 梁曉：《一個紅衛兵的自白》（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頁295-98。
- ⑮ 桑暉：〈殘陽如血〉，《讀書》，第1期（北京：三聯書店，1991），頁68-74。
- ⑯ 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紅旗》，1967年，第14期，頁11。
- ⑰ [英]弗雷澤著、徐育新等譯：《金枝》（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頁306。
- ⑱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頁306。
- ⑲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頁118-19。
- ⑳ 張戎著、張樸譯：《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台灣：中華書局，1992），頁215。
- ㉑ 蕭乾：《負笈劍橋》（北京：三聯書店，1987），頁14。

王毅 1954年生，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北京三聯書店《愛樂》叢刊特約編審。曾發表文史哲及宗教、建築園林和「文革」研究等方面的多種論述。